

鲁迅文集

导读本

【且介亭杂文二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医药学院610 2 01025430

鲁迅文集

第18卷



且介亭杂文二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且介亭杂文二集

序 言	(3)
一九三五年	(5)
叶紫作《丰收》序	(5)
隐 士	(8)
“招帖即扯”	(11)
书的还魂和赶造	(14)
漫谈“漫画”	(17)
漫画而又漫画	(2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22)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39)
“寻开心”	(42)
非有复译不可	(45)
论讽刺	(48)
从“别字”说开去	(51)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56)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59)
人生识字糊涂始	(64)
“文人相轻”	(67)
“京派”和“海派”	(70)
鎌田诚一墓记	(75)
弄堂生意古今谈	(76)
不应该那么写	(79)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82)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89)
什么是“讽刺”?	(92)
论“人言可畏”	(95)
再论“文人相轻”	(99)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102)
文坛三户	(105)
从帮忙到扯淡	(109)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112)
“题未定”草(一至三)	(114)
名人和名言	(122)
“靠天吃饭”	(126)
几乎无事的悲剧	(128)
三论“文人相轻”	(131)
四论“文人相轻”	(135)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138)
“题未定”草(五)	(143)
论笔毛之类	(149)

逃 名·····	(152)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155)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158)
萧红作《生死场》序·····	(162)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165)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168)
杂谈小品文·····	(170)
“题未定”草(六至九)·····	(173)
论新文字·····	(187)
《死魂灵百图》小引·····	(190)
后 记·····	(193)

五三六一，藏八十四，及樂部，平五三六一，書部，平五三六一，
藏部，平五三六一，藏部，平五三六一，藏部，平五三六一，藏部，平五三六一，

且介亭雜文二集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五年所作杂文四十八篇，一九三五年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第二卷杂文合集

序 言

本文作于1935年12月31日。《且介亭杂文二集》是鲁迅1935年四十八篇文章的结集，加《序言》及书后《附记》，共五十篇，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文章概括介绍了本集杂文的特点，指出这些杂文虽大受攻击，有的甚至被禁止，但事态的发展，大都为这些杂文所“言中”。文中还坚定地表示要斗争到底：自“华北自治”以来，有些“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而“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尽管受尽“外力的压迫”，“但是我不想求保护。”《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以华制华”，1933年4月2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了鲁迅《以夷制夷》一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华制华”的策略，傅红蓼等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文章，对鲁迅进行攻击。

*

*

*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知邵洵美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纪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一九三五年

叶紫作《丰收》序

本文作于1935年1月16日,初载于3月上海容光书局版《丰收》。

文章充分肯定了叶紫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实绩,驳斥了“第三种人”等“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主张,批评了某些人脱离实际鼓吹去写“伟大作品”的错误论调,指出,“文学是战斗的”,叶紫的创作是在压迫者的“摧残中”,在“转辗的生活中”,“尽了当前的任务”,因此,他的作品“也更加坚实”、“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不仅为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而且还赢得了“世界的读者”。叶紫(1912~1939),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左翼青年作家。作品有短篇集《丰收》、《山村一夜》和中篇《星》,大都以1927年家乡的革命事件为题材。《丰收》,收《丰收》、《电网外》等六篇短篇小说,《奴隶丛书》之一,1935年3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

*

*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滸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

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训过我们,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

隐士

本文作于1935年1月25日，初发表于同年2月20日上海《太白》半月刊一卷十一期，署名长庚。

文章针对当时文坛上某些人鼓吹“隐士风度”，提倡用“隐逸”、“闲适”的小品文笔调写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等言论，从历史上揭露了所谓“隐士”的真相，指出真的“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旦“隐”而能出名，挂上隐士的招牌，“归隐”便与“登仕”一样，“也是噉饭之道”。而有的自己还不配“隐”的人，只好揩一点“隐”油，“啃招牌边”，为他人的“隐”开锣喝道，“其实也还不外乎噉饭之道”。因此，这些人所谓“超然”、“清高”，其实全都是假的。陈眉公（1558～1639），原名陈断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一面隐居小昆山，一面出入官绅之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见清蒋士铨所作《临川梦》传奇中《隐奸》一出出场诗的末两句。“云间鹤”，原诗

为“云间鹤”。

*

*

*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屨，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

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噉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噉饭之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噉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

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

“招贴即扯”

本文写于1935年1月26日，初发表于同年2月20日上海《太白》半月刊一卷十一期，署名公汗。

文章针对当时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抬出明代文学家袁中郎作为他们提倡“闲适小品”的招牌广告，指出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而“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因此，把袁中郎作“闲适小品”的广告，实际上是把袁中郎“画歪”了。这一揭露，无疑等于扯去了某些人张挂出来的袁中郎招贴，这也正是本文题目“招贴即扯”的含意所在。袁中郎(1568~1616)，名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世称“公安派”。三袁中宏道成就较大。其作品真率自然，除写闲情逸致外，部分篇章反映民间疾苦，对当时政治现实有所批判。作品有《袁中郎全集》。

*

*

*

工愁的人物,真是层出不穷。开年正月,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这才叫作希奇,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来大约也不会有。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然而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但是,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具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的死敌而外,还有什么?

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疾恶如仇,对小人决不假借。他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自反录》)推而广之,也就是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